

海明威——中美文化交往的热点

杨仁敬

1929年,一部反映经历世界大战打击的西方青年的苦闷和失落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震动了世界文坛,作者成了美国划时代的作家。他,就是后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欧内斯特·海明威。

海明威是我国读者最熟悉的美国作家之一。从三十年代至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在中国的声誉有增无减。他的作品大部分已陆续译成中文。他成了中美文化交往的热点。

近代中美文化交往的历史不算太长,大体可追溯到1900年前后。当时晚清流行的翻译小说中有《圣经》故事和美国作家欧文的《随笔》。稍后林纾翻译的183部西洋小说中也有20多部美国小说,其中斯托夫人的《黑奴呼天录》,至今仍十分脍炙人口。那时的翻译与政治改革有关。严复译介了不少英法两国著名的哲学和政治经济论著。林纾译的小说也以英法为主。

第一次大战结束后,美国跃居世界最大债权国地位,国际影响日益超过英法。美国文学引起了各国的重视。这时,海明威以清新简洁的写实风格与盛极一时的英国作家乔伊斯的心理分析小说分庭抗礼,开创了西方小说的一代新风。这颗美国文坛升起的新星,引起了中国文化界的注目。1933年至1935年,上海青年作家和翻译家纷纷著文加以介绍。后来,他的主要作品就陆续翻译进来。五十多年过去了,我国历经沧桑,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美文化交往几起几落,开始出现正常发展的新局面。美国文学作品大量译介到我国来,海明威又受到新一代中国读者的欢迎,成了中美两国人友好交往的桥梁。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对海明威作品的翻译和评介,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933年前后至1949年):抗战前以译介海明威的短篇小说为主,注意到海明威作品的主要特色及其在美国和西方文坛的地位和影响。抗战中,对海明威反映西班牙内战的小说,尤其是《丧钟为谁而鸣》特别感兴趣。1941年春海明威的中国之行进一步扩大了他在华的影响。

严格地说,这个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1937年抗战爆发前和抗战开始至1949年。海明威1916年开始写小说,至30年代初已出版了六本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1929年问世的《永别了,武器》奠定了他在美国新文坛的地位。但我国文化界迟迟没有反应。虽然《永别了,武器》的电影早在上海放映过,可是海明威的短篇小说还没译过来,专论更没有。直到1933年9月,黄源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了《美国新进作家海明威》并译了他早期的短篇小说《暗杀者》(The Killers)。翌年,《现代》杂志刊登了叶灵凤的《作为

短篇小说家的海明威》。1935年，赵家璧和施蛰存分别在《文学季刊》和《新中华》发表了《海明威研究》和《从亚伦坡到海明威》。这个阶段，评介文章虽然不多，但意义重大，不容忽视。在这些文章里，作者首先介绍了海明威在美国文坛的出现和影响。黄源指出：“目下我们一谈到美国的现代文学，便少不了提到他。他的作品以形式手法的独特新奇，颇得到欧美读者的欢迎……他是同时代作家中最有创意的作家”。轰动一时的《永别了，武器》证明“他是个彻底的写实派作家”^①。叶灵凤肯定海明威是描写战争题材的作家中“最出色的一个”，并强调海明威的风格是：“将整个所谓迷途的时代（Lost Generation）的创伤、不安和苦闷，用自己所追寻的文体传达了出来”。^②赵家璧也认为，海明威作品“正是战后一代青年思想的反映，而他散文的特殊风格，引起了许多人的模仿，至今是被人称做近代美国文坛上发生影响最大的一个”。^③为什么呢？因为他所代表的便是对于支配世界文坛的乔伊斯小说的心理描写的反抗。“他抛弃了当时最流行的心理分析，把一切归还到动作的本身，把官能印象，作为他写作和生活的中心”。^④赵家璧还认为：“海明威便是最反对现代文化的人……他在大战场上得来的经验，使他看破了一切文化，而把他所生存着的社会，看做一种虚伪的结合”。因此，他回到初民的粗鲁的动作中去找安慰”。^⑤这些看法大体上反映了我国文化界1937年抗战前对海明威的评价。

抗战期间，由于反对侵略，保卫祖国的需要，我国大量翻译世界文学名著和反法西斯文学，诚如郭沫若在《抗战与文化》一文中所说的：一切文化“要集中于抗战有益这一点”。现代美国小说家的作品陆续译过来，主要有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等6种、马尔兹的《实情如此》、考德威尔的《烟草路》、路易斯的《大街》、法斯特的《一个民主的斗士》、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日》、萨洛扬的《石榴树》、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人鼠之间》和《月亮下去了》、海明威的《战地春梦》、《战地钟声》、《第五纵队》和《蝴蝶与坦克》等^⑥。茅盾特别推崇海明威和斯坦贝克两人。他强调指出：《战地钟声》（即《丧钟为谁而鸣》）是海明威“描写西班牙内战的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部小说”。因此，海明威有关西班牙内战的作品深受欢迎。

根据冯亦代先生的回忆，1938年初，他在香港看到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告发》，很受感动，后来又看到《蝴蝶与坦克》和《大战前夕》，便将它们译出来，以鼓动民众抗战。1941年，他到重庆后又译了《桥头的老人》和剧本《第五纵队》。这个剧本曾作为应云卫在重庆创立的中华剧艺社的演出剧目。^⑦因为国民党当局对于国统区进步作家写的剧本往往多方刁难，不准上演。《第五纵队》内容适合动员民众抗战，激发爱国情绪，容易获准上演，发挥宣传作用。

由黄嘉德、黄嘉音和林语堂合编的《西书精华》1940年春季号介绍了西班牙战争的文学。1941年第三期推荐《第五纵队》，并提到《丧钟为谁而鸣》被列为1941年美国畅销书第二位和获得普立策文学奖的提名。后来又发表了李信之寄自美国的《战争小说〈丧钟〉》一文。作者认为海明威是个杰出的战争小说家。《丧钟》在内容上和技巧上比《战地春梦》好得多。有些美国评论家认为它是海明威的最佳作。同时，他又指出：整个作品的速度太紧张，简直令人无法透气，结局又突然陷于松弛，失去平衡。总的来看，这个评价是公允的、客观的。

《西书精华》还报导说：《丧钟》初版21万册，一周后又加印5万册，1940年底已发行36万册。1941年初已销50多万册，仅有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飘》和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可与它相媲美。这些信息激发了读者对海明威的兴趣。1944年，谢庆尧的中译本《丧钟》问世。西风出版社约请林疑今译了《永别了，武器》，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1941年3月，海明威偕夫人的中国之行使他在中国的影响达到了高潮。国民党的机关报《重庆中央日报》经常报导他在各地的活动。蒋介石夫妇亲自接见了海明威夫妇并一起进餐。他秘密会见了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并深入各地采访，赞扬中国民众的抗战热情。

海明威在《午报》上发表了六篇中国之行的报导。在这些报导里，海明威如实地反映了中国抗战的形势，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他要求美国政府明确地向蒋介石表明：美国不支持中国打内战。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同日军英勇作战，而蒋介石却把他们当为自己的“心脏病”，欲除之而后快，只把日本侵略者作为“皮肤病”。如果国共摩擦加剧，中国出现内战，日本就可能征服中国，美日开战便难以避免了。

海明威夫妇离开重庆去仰光的前夕，九个抗日团体联合举行了盛大欢送会，为他俩送行。三百多位来自外交、政治、新闻和文化单位的中外贵宾出席了会议。海明威激动地说：“太奇妙了！太奇妙了！”《重庆中央日报》以显著篇幅作了报导。海氏的访问即为中外人士所瞩目。

海明威来华访问时正是抗日战争处于最困难的阶段。日本侵占我国大片河山，蒋介石急需美国的援助，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美国也需要中国把日本拖住，以推迟日本进犯东南亚的时间。因此，蒋介石任命著名留美学者胡适为驻美大使，罗斯福总统和国务卿赫尔4月6日亲自宴请新任驻华大使高斯。4月29日蒋介石新任外交部长郭泰祺抵华盛顿访问，美国表示将增加对华贷款和援助。美国朝野人士和作家如罗斯福总统的儿子克里、《时代》和《生活》的总编辑鲁斯夫妇、著名小说家考尔德威尔夫妇、作家布科莱德女士等纷纷来访。他们的影响当然比不上海明威。海明威有关中国抗战的报导发表后仅几个月之久，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事件就爆发了，美国匆忙对日宣战。反法西斯战争跨入了新阶段。历史发展说明：海明威的估计是符合实际的。

由此可见，作为记者和作家，海明威不仅是美国人民的文化使者，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共患难时刻的联系纽带。

第二个时期（1949年至1965年）中美关系不好，但海明威小说继续出版，评论很少。50年代，苏联文论的影响较大，“文革”前开始摆脱这种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0年爆发了朝鲜战争，中美两国关系开始了不愉快时期。但是，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并不一概排斥美国作家。1952年朝鲜战争还没停息，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就再版了林疑今译的《永别了，武器》。1957年，海观译的《老人与海》问世。《文汇报》转发了苏联关于海明威生活和工作的报导。60年代初，《世界文学》译载了海明威的短篇名作《杀人者》和《打不败的人》。不过，评论几乎见不到。

1961年7月，海明威与世长辞了。《文汇报》于同年8月22日刊登了翻译家赵家璧的纪念性文章《永别了，海明威》。翌年，《文艺报》译载了芬寇斯坦的《悼海明威》。文

章虽不多，却表达了中国作家和读者对这位伟大的美国小说家的怀念和尊敬。

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台湾海峡一度出现紧张局势，中美仍处于严重对峙状态。因此，大专院校里，中文系和外文系涉及美国文学的课程极少。国内的反右派运动也使教师们对美国文学不敢问津。美国文学的资料奇缺，学生也没机会接触。

另一方面，即使讲点美国文学，总是难于跳出苏联文艺理论的框框。记得1959年读过一本苏联三个专家合写的《英美文学与文体研究》（英文版），书中谈到美国现代作家时，专章讲述的仅有马尔兹（Albert Maltz）和法斯特（Howard Fast）两人，加上前一章介绍的欧·亨利、杰克·伦敦和德莱塞等人总共还不到10人。对辛克莱·路易斯和海明威两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则一笔带过，连他们的作品一本也不提。编者往往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最高的准绳来衡量美国作家，尤其强调这些作家对待苏联的态度，因此未免失之偏颇，视野狭窄。也许正是这种观点一度影响了我国对海明威作品的译介工作，比如迟迟没有再版或翻译《丧钟为谁而鸣》，拖至80年代初才重译出版。有的图书馆认为《永别了，武器》宣扬了和平主义，不许公开出借。

1962年，《文学评论》发表了董衡巽的《海明威浅论》。这是“文革”前最重要的一篇系统评述海明威的论文。作者全面分析了海明威的主要作品及其价值和局限性，大胆地指出：海明威是现代美国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个小说家。《永别了，武器》虽然带有悲观绝望情绪；跟具有一定反法西斯倾向的《丧钟为谁而鸣》一样，应该列入美国二十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老人与海》的主人公圣地亚哥具有硬汉性格，是个“超人式的英雄”，缺乏真实性和典型性，反映了作者逃避现实的倾向。海明威的人物有三个特色：坚强的意志、重视感觉经验和朋友间的友谊。海明威作为一个艺术家在思想和艺术这两方面的表现是不平衡的；他的艺术才华超过他对生活的认识能力。他的风格含蓄，文体简洁优美、但有时显得狭隘和单调。他是个有正义感的作家，敢于说出心里话，创作态度严肃，艺术上有独创。这篇论文肯定了海明威在美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上的地位，并指出他的局限性。这对于苏联50年代的传统看法是个挑战。作者同时批判了当时国内流行的“拔高主题”的做法，但对海明威的批评似多了些。“拔高”显然不妥，但海明威小说的内涵和人物形象的美学价值还是值得深入探讨的。无论如何，此文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三个时期（1966年至1976年）：海明威作品被封存，但在读者中悄悄传阅。十年动乱造成了我国文化界的空前浩劫。外国文学当然无法幸免于难。中美之间的文化交往几乎完全停顿。

《永别了，武器》和《老人与海》虽然不能从图书馆借到，但在厂矿和乡下的知识青年中却悄悄传阅着。吸引青年读者的是它的精神力量。记得有个矿工出身的作家说过，“文革”期间感到失落，不知所措，后来偶读《老人与海》深受启发，铭记老人“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的名言，发愤自学，勤奋笔耕，终于写出了一篇篇好小说，如今已挤身于专业作家之列。他深有感触地说：“历史将会证明：海明威象莎士比亚一样，是属于全世界的。他给读者精神上的影响是永恒的”。

第四个时期（1976年至今）：海明威作品又大量翻译出版，研究范围日益深入扩大，对外交流有所发展。“四人帮”垮台后，拨乱反正，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加

上中美两国关系的恢复、改善和发展，美国文学的译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海明威又成了中美文化交往的热点。

近10多年来，几乎年年都有海明威作品的中译本问世。1979年，上海再版了《老人与海》6万册。1980年又重印了《永别了，武器》8万多册。1982年，上海译文等出版了《丧钟为谁而鸣》的三个不同的译本，单上海就印了75,000册，数量可观，不久即告罄。1983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印了冯亦代重译的《第五纵队及其他》25,000册。198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新译本《太阳照常升起》印数达62,000册。这部1926年问世的名作经过近60年才进入我国书市。1985年，《流动的圣节》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附有美国海明威学者哈里·斯通贝克写的前言。同年三联书店发行了《海明威谈创作》。1987年，上海又出了《老人与海》的新译本。

与此同时，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又陆续与读者见面。1979年《译林》创刊号发表了《印第安人营》。1980年，《当代外国文学》刊载了《雨中的猫》、《一个明净的地方》和《暴风雨之后》。1981年以来，《外国文艺》、《美国文学》、《春风译丛》、《外国文学》和《名作欣赏》以及一些原来只发表我国文学作品的文学刊物如《十月》、《花城》、《作品》、《百花洲》和《山花》等也刊登海明威的短篇小说，有的还发表了评析文章。上海译文出版社出了《海明威短篇小说选》。商务印书馆则把海明威的短篇小说选作为英美现代文学注释丛书之一，供青年读者直接阅读原文。有几个名篇还入选了《美国短篇小说选》（1978）和《美国短篇小说选读》（1980），《老人与海》则被选入《外国优秀中篇小说选》。

有关海明威的书信和传记也引起了我国学者的注意。《世界文学》和《译文与评介》等刊物分别选译了著名海明威学者卡洛斯·贝克编注的《海明威书信选》的一些信件。贝克另一部权威性的力作《海明威生平的故事》也出了两个中译本。浙江还出了库尔特·辛格写的《海明威传》。董衡巽主编的《海明威研究》（1985年增订本）选辑了欧美和苏联学者对海明威的各种不同的有代表性的评论，有助于读者拓展视野。

1979年8月中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促进了海明威的研究工作。后来，中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分别在上海和南京召开了两次年会。大会收到的论文有几篇是研究海明威的。国内报刊上也经常可看到评介海明威的文章，涉猎的范围越来越广，从他的战争观、位置感、文体风格、创作原则和文字技巧，到他的中国之行，他与中国作家的比较研究等等，令人耳目一新。同时，海明威的作品进入了大专院校的课堂，成了中国师生和外籍专家的热门话题。有些研究生还将他选为论文的课题。

中国对外国文化的重视，特别是对海明威的重视得到了外国学者的交口称赞。1986年6月我国首次派人出席了在意大利召开的第二届海明威国际会议，并宣读了论文，受到与会者的欢迎和赞赏。曾在南京大学任教的美国学者弗兰德教授作了专题报告，赞扬80年代的中国作家和学者完全理解和把握了海明威作品的精神，使与会的10几个国家的学者大为惊喜。同年11月，中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在厦门大学召开了海明威学术讨论会。这在解放以来还是第一次。到会的有全国30多个单位的54位代表。提交大会的论文或提纲有20多篇。大家肯定了海明威对美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重大贡献，并对“海明威与迷惘的一代”交换了不同的看法。这个会议标志着我国海明威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中国和美国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在价值观念、心理机制和道德习俗方面也有很大差异。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海明威在我国的影响经久不衰,而且出现过两次热潮,一次在抗日战争期间,一次在1976年至今。不管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或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后,海明威在中国读者心目中都占有一定地位。这是颇发人深思的。

首先,海明威作品所反映的思想内容,尤其是《丧钟为谁而鸣》中美国大学讲师乔登为正义而献身的精神和西班牙劳动人民英勇抗击法西斯侵略的爱国主义行动对我国读者很有启发。他笔下那些在逆境或困境中顽强搏斗,百折不挠的“硬汉子”形象很容易引起我国读者的共鸣。中华民族是个勤劳勇敢的民族,一百多年来内忧外患不断,斗争不息,才有今天的变化,因此,特别赞赏这种打不败的性格。其次,海明威的风格很象我国小说的白描手法,比起那些虚幻的心理描写,更容易为我国读者所接受。再次,他的“真善美”的美学原则也是我国作家所熟悉的。他认为“作家的职责是讲真话”。他要“用最简洁的形式写下自己的所见所闻”。^①他出生入死地深入战地,写下了体现时代精神的名篇巨著。这一切都使海明威跨越中美的国界,克服时空差异和文化隔阂,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扎根,并成了中美文化交往的热点。

今年是海明威诞生90周年。美国将举行5个学术会议。我校将与广西师范大学在桂林联合举办海明威国际学术研讨会。^②我国学者将与来自1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同行交流成果。可以预料,中外文化交往会有新的发展。

注:

- ① 见《文学》第1卷第3号, P.448, P.449
- ② 见《现代》第5卷,第6卷, P.991, P.992
- ③④ 见《文学季刊》第2卷第3期, P.728
- ⑤ 见《抗战文学概观》,苏光文著, P.70
- ⑦ 《近年来介绍的外国文学》,见《茅盾文艺杂论集》下集, P.1051—52
- ⑧ 《重译后记》见冯亦代译《第五纵队及其他》PP.194—195
- ⑨ 见《西书精华》,第五期,1941年春季号, P.31
- ⑩ 《重庆中央日报》1941年4月15日第二版
- ⑪ 《文学评论》1962年,第2期
- ⑫ 《文学的力量超越国界》,见《译林》,1986年第2期
- ⑬ 上海《文学报》,1986年8月21日,第1版
- ⑭ Carlos Baker 著 Ernest Hemingway, The Writer as Artirt, (3rd edition) P.48
- ⑮ The Hemingway Newsletter, NO. 17/January 1989